

天津出版史料

第二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出版史料

第 二 辑

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
天津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
《天津书讯》编辑部

主 编

孙五川 林 呐 李树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出版史料（第二辑）

天津新闻出版管理局出版史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

天津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研究会

《天津书讯》编辑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1/8 插页4 字数10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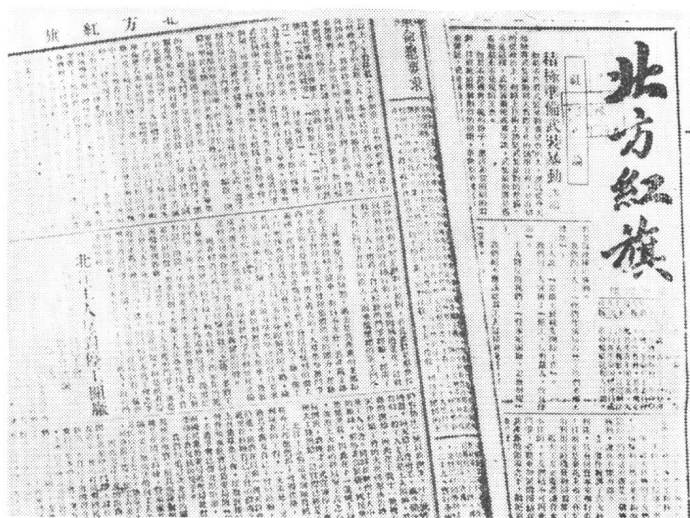
印数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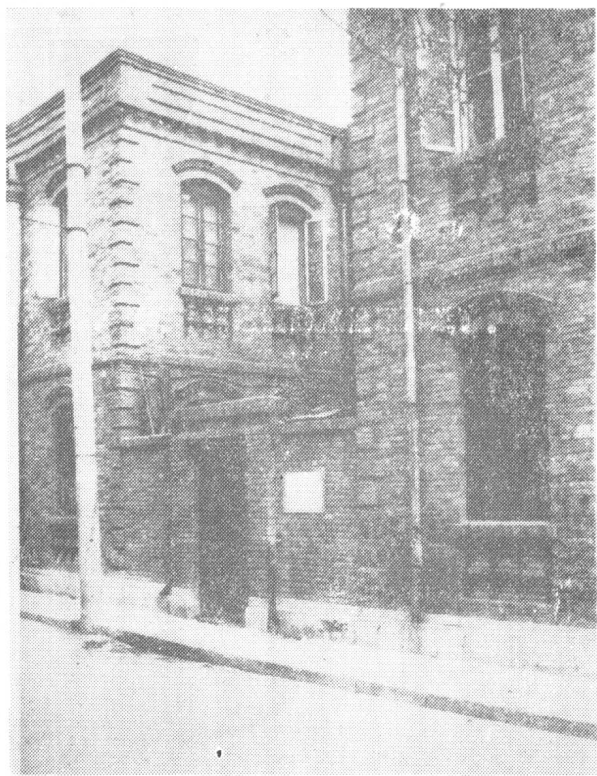
ISBN7-5306-0486-4/k·2

定价：2.60元



● 华新印刷公司印制的各种党内刊物





华新印刷公司旧址

(天津党史办公室供稿)

民國八年天津各界被拘代表

警廳拘留記

天津新民意報社印行

每冊三角 每冊九角 定價每冊一元

警廳拘留記

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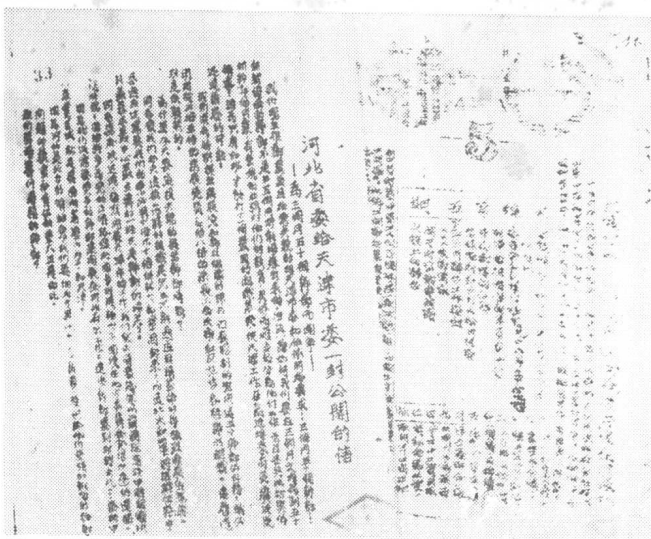
周恩來編

天津抵制劣貨的舉動，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在南開操場開國民大會後，商學兩界會同各團體組織國民大會委員會，立意辦理這件事，當時的情形，很可令人樂觀。今年一月初，商學各團體公會，又表示商人自決，對於販賣劣貨的抵制方法，分爲三類：(一)連到已經起封的劣貨，應將貨物種類開數目，報告國民大會委員會；由商學兩界會同查明確實後，得在市上銷售。(二)連到尚未起封的劣貨，應封存不准出售。(三)已從尚未運來的劣貨，應去信退還。商人自有此種辦法表示後，封貨查貨的事，遂立刻舉行；而去信退還的事，也同時并舉。抵制的功效，方顯漸漸的實現。不意越發成愛國學生調查劣貨，勾引日人毆擊學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二月全九省公署前流血慘劇。從此天津的平民運動，遭受了極大的打擊，一切設施，總

● 1920年天津新民意報社出版的《警厅拘留记》和周恩来写的“小引”。

警廳拘留記
大津抵制劣貨運動，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在南開操場開國民大會後，商學兩界會同各團體組織國民大會委員會，立意辦理這件事，當時的情形，很可令人樂觀。今年一月初，商學各團體公會，又表示商人自決，對於販賣劣貨的抵制方法，分爲三類：(一)連到已經起封的劣貨，應將貨物種類開數目，報告國民大會委員會；由商學兩界會同查明確實後，得在市上銷售。(二)連到尚未起封的劣貨，應封存不准出售。(三)已從尚未運來的劣貨，應去信退還。商人自有此種辦法表示後，封貨查貨的事，遂立刻舉行；而去信退還的事，也同時并舉。抵制的功效，方顯漸漸的實現。不意越發成愛國學生調查劣貨，勾引日人毆擊學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二月全九省公署前流血慘劇。從此天津的平民運動，遭受了極大的打擊，一切設施，總

● 《警厅拘留记》手稿。



1926年又新印字館出版的《检厅目录》。

檢廳目錄
民國九年四月七日
魏八編年，警廳用員甚多，將我廳二十一人分派地方檢察廳。二十一人分派楊曉林、
時子剛、董嘉侯、馬子里、夏黎南、馮曉、師士傑、劉士傑、郭曉、李學
浩、謝景輝、李萬豪、吳世昌、郭士良、郭曉、陳曉、李學
浩、李曉良、
九號修二十一人齊談檢廳，在待賓室等了點鐘，由檢廳四和處，對一月二十四
日檢捕的人，問了問檢廳檢捕的事，對一月二十九日檢捕的人，問了問當
天省署請願的事；至於楊曉林也問及調查日貨的事。
十一號由司法廳檢廳大家來省署問檢廳的事，檢廳由所，由十九人選刑
事大廳，由民事看官，分由五間房，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
重一室安設，問有三個女廚子輪流看。我對十九人選入看守所後，對於住室甚為
意，並長明中道無警巡視一機，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
走開門檢廳，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檢廳由所，
八日：
早晨大家商定各家中每日有檢廳員一人，同時並有各人本室，會商全體事宜，另於



目 录

天津图书出版史略（1946年5月—1966年5月部分）（初稿）

任希儒（1）

狱中斗争的真实记录

——《警厅拘留记》和《检厅 目录》

廖永武（53）

《觉悟》和《觉邮》（上）

金荣光（69）

“华新印刷公司”始末

范文光（79）

《历史教学》月刊简记

程 秀（84）

《支部生活》复刊以来的回顾

吴公绍（95）

普及为主 兼顾提高

——天津“人美”画册编辑室工作回顾

张万夫（102）

天津新闻出版资料编目

范文光 金荣光（107）

小
资
料

向叔保谈天津知识书店

宋玉麟（127）

解放前的天津机印年画

草 元（128）

天津早期团组织的出版活动

草 元（128）

华世奎出资办书店

草 元（129）

●任希儒

天津图书出版史略

(1946年5月——1966年5月部分)

(初稿)

前 言

据史载，天津最早的志书《天津三卫志》，刊行于明正德年间（1519年）。这或许是天津有图书出版的开始。那以后，以迄天津解放以前，已读到的出版资料，比较支离零星。这样，能否得出近、现代天津图书出版很不成气候的结论？不敢说。由于资料汇集艰难，谁也难保不会重蹈一璞在手，不识卞玉的覆辙。

如此情况，只好删繁就简，避难趋易，先给天津图书出版的历史的研究设一个辖度：暂限于党领导下的图书出版，以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和读者两个地下书店为起点。如此叙述，庶可反映当代天津图书出版的基本面貌；其他，留待以后。

党领导的图书出版事业，在天津，最早的是先后建于1936年的北方书店和知识书店。北方书店建于1月，8月，遭敌人查禁。知识书店建于9月，翌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9月，书店结束。二店活动情况、建树的资料，尚付阙如。

中断十年，迄解放战争期间，自1946年始，知识和读者两个地下书店先后建立，天津又开始了党领导的图书出版活动。

目前，天津有图书出版社十二家，计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天

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科技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以上七家为市出版局直属）、天津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杨柳青画社、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局直属七家中的六家文字出版社（人民、百花、科技、新蕾、教育、古籍），是以两个地下书店（知识、读者）为基础，迭经改组，发展而来，经历四十年。另一美术出版社，则属解放后，遵广大群众之需，循传统年画出版之迹，异军突起，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

按时间顺序，大致情况如下：

1946年5月，原是同仁性质的知识书店，经过改组，成为党领导的地下书店。

1947年7月，读者书店建立。

天津解放后，两店赓续发展，1950年5月，合并为知识书店。

1952年9月，知识书店改组为天津通俗出版社。

1954年8月，天津美术出版社（现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诞生。

1956年3月，天津通俗出版社改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8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立。

这样，迄1966年“文革”开始前，天津的出版社仅有人民、美术、百花三家。

十年动乱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人民、百花两社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科技、新蕾、教育、古籍四社，天津的出版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下面分章叙述天津的图书出版从地下书店时期以迄十年动乱前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试探得失，借以汲取经验教训。

第一章 暗夜萤光

（1946年5月——1949年1月）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踌躇满志，下山摘桃，继续推行其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贪贿公行，民不聊生，引起以反独裁、反内战为中心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沦于敌人铁蹄之下八年的天津人民，历尽屈辱，一朝光复，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尤为强烈。

当时，天津图书业情况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类，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和中国文化服务社。

正中书局，为统制思想和牟取暴利，垄断全部官撰教科书的发行。但它志大才疏，许多有分量的专业教材供应，仍不得不仰仗商务、中华、开明等私营书店。此外，它还是蒋介石言论集的专供户。

中国文化服务社，属于国民党CC系。出版发行CC系著作，迫于民主运动的形势，也经销其他新书，以广招徕。

第二类，现代出版发行先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

三家基地皆在上海，天津设有分支机构。

商务建于1897年，值维新变革思潮如火山喷发之际。1912年建立的中华书局，更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1926年，开明书店建于大革命浪潮中。它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以革新面貌出现，所出版的新型教科书，不拘一格的社会科学和科技、文艺读物，以及对西方学术、文学论著的介绍等等，在继承、积累古代优秀文化、传播现代新兴文化上，成绩卓著，在与封建文化的冲撞

中，功不可没。

第三类，小型书海。

分布于城乡各个角落的小铺面或小摊位的书局、文具店，规模微小，难以计数。它们多因时因地制宜，图书、文具兼营，或以唱本为主，或以小说取胜，各自为了生存，以独特的购销方式，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略窥此种书局集聚的天祥市场二楼，可见一斑。比如，新基书局以经营外文书刊为本，文化书局以经营古籍擅长。有的书局，左手可以拿出《列文选》、《资本论》；右手又可以拿出香港张竞生博士的《性史》和春宫图。不同色彩的读者，到这里都可有所获。

可以说，在这小型书海里，有多少档次的读者，就有多少档次的书刊；社会有多乱，书刊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多乱。自发调节，价值规律使然，在传播文化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无政府的“自由”。

上述各类都是图书发行业，或属图书出版单位在津的分支机构，或系独立经营，在文化传播上，新旧杂糅，呈现混乱状态。

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生活书店对天津的巨大影响。生活书店诞生于十年内战中的1932年。革命浪潮的推动，使这个书店风格独具，它不以传播知识为满足，而是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致力传播民主与科学，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建店宗旨，开一代书店新风。它的创办人，著名民主战士邹韬奋所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迄今仍为革命出版工作者必读的重要著作。生活书店在天津没有分支机构，但它雄踞上海，影响遍及全国，它的建店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天津。它以自己出版物流传的巨大影响，紧扣民主运动的形势，发挥对形势的推动作用。

在新旧文化斗争日益尖锐的形势下，1946年5月，知识书店

成为党领导的文化阵地。1947年7月，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读者书店诞生，生活书店的建店思想和经营经验也给予他们以极大的启发。

一、知识书店

知识书店是在地下党领导的北平中外出版社支持下，于1945年12月，由杨大辛创办，地址在今和平区辽北路。开业之初，即经售由中外出版社提供的《战时苏联游记》（斯诺）、《中国解放区印象记》（福尔曼）、《苏联纪行》（郭沫若）、《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延安归来》（黄炎培）、《木刻选集》等等。从1946年初起，利用国共和谈的形势，还出售毛泽东著作和解放区报刊，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以及《晋察冀日报》、《北方文化》等等，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

不久，建于1945年10月的文化人联合会（简称“文联”，中共地下党领导），编辑出版机关刊物《文联》周刊（后改为半月刊），以知识书店为总经销处。

在“文联”支持下，知识书店创办《鲁迅文艺》月刊。除刊载“文联”会员作品外，还大量刊载大后方和解放区著名作家的文章，前后出版三期。

符合民主运动潮流的知识书店，业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天津进步文化界的一个活动阵地，为“文联”成员经常聚会之所。因此，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监视和骚扰。

业务扩大，资金拮据，1946年初夏，开办四个多月的知识书店，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地下党员李克简和王希贤，以杨大辛友人名义，于1946年5月，以党的活动经费投资接兑。从此，知识书店由地下党领导，利用合法阵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

思想和进步文化。

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在上海，上海是书店进货的主要渠道。知识书店先后与生活、新知、读书、华夏、时代、作家、晨光、群益、海燕、文化生活、骆驼等进步出版单位建立购销关系，新书刊源源而来，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的《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著作，北京、上海等地秘密印刷的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小册子（如《论纸老虎》等），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刊物（如《时与文》、《文萃》等），书店都有出售，也有少量解放区出版物和香港翻印的解放区书刊。

为掩敌人耳目，店里的书架上也陈列着《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等书。一些明显的共产党理论和政策的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整风文献》等等，只有与店员熟识的读者方能买到。

书店还有一个特殊进货渠道，即属于国民党CC系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为招徕读者，该社也经售其他书店的新书，但它在上海的采购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几次不分青红皂白地购进一些进步书籍。这类书他们卖不得，只好按原价转给知识书店，这当然是知识书店求之难得的事情了。

知识书店建立之始，即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和支持，1946年5月以后，更在地下党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中，利用合法身份，通过书刊发行，广泛传播革命思想，使许许多多青年从这些书中发现了真理，产生了希望，探索到前进的道路。书店的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

此时，全国解放战场上，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管区反动当局残酷镇压民主运动，也把黑手伸入知识书店。警察局、稽查处都公开出面检查，没收一些期刊和书籍。1947年11月，书店编辑出版的新书评介《知识通讯》，刚刚问世，便被扼杀。

书店的工作人员，随业务发展而增加，先后有杨大辛、杨希

尧、桂文城、徐习武、陈少年等。他们都一直坚持到天津解放。1948年11月20日，杨大辛和桂文城突然以“及龄壮丁”身份，被强征入伍（保安旅），这是敌人迫害的致命一招，书店营业基本瘫痪。

二、读者书店

读者书店是自1946年，由三个青年发起，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工作的。他们是李秉谦、赵光谦、骆振东（现名骆群）。李秉谦是北平辅仁大学学生，因染肺病，休学在家。赵光谦和骆群都是共产党员。赵光谦正失业；骆群是天津敌伪产业处理局职员。三人原是铃铛阁中学（今市三中）同学，又是经常一起切磋的书友。由李秉谦提议，三人议定，开办经售进步书刊的书店，以满足各界青年对新书刊的渴求，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经向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娄凝先汇报，经冀中城工部同意，用群众集资方式开始筹备工作。

李秉谦、赵光谦、骆群与喜欢读书的中学同学刘道庄、任希儒议定：分头筹集资金；确定店名为“读者书店”，取义是：书店属于读者，读者是书店主人。由五人组成书店理事会，共推李秉谦为经理，赵光谦为副经理兼帐务。

书店原定于1947年7月1日开业，后为避敌人耳目，改为7月6日。店址在今南开区袜子胡同49号，铺面一间，后面一间办公兼宿舍。

为开辟进货渠道，先后联系了上海的生活、新知、读书、时代、作家、晨光、群益、文化生活，北平的中外出版社，香港的新民主出版社等等进步出版单位；知识书店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小小的店堂，两面书架，一张杂志台，一张小办公桌，架下、台前，放着二三供读者休息的小圆凳，十分简陋。

引人兴趣的，是架中台上拥抱在一起的书刊：《大众哲学》、

《新人生观》、《新哲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社会发展史纲》、《窃国大盗袁世凯》，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的小说、杂文、诗歌，苏联翻译小说，《时代》、《文萃》、《群众》、《民生》、《展望》、《观察》、《世界知识》、《现代知识》等期刊。也有古典作品：《诗经》、《庄子》、《孟子》、《陶渊明集》、《乐府诗集》。还有一些时髦书：《啼笑姻缘》、《春风回梦记》、《旧巷斜阳》等。从正中书局进的几本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等也夹在书丛中。

书刊陈列整体，是执行了传播进步文化并以“灰”色为掩护的方针。

同知识书店一样，读者书店的建立，适应了民主运动高潮的形势，符合苦闷中追求光明的广大读者的需要。开业伊始，读者蜂拥而至，绝大多数是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当地处僻巷的读者书店里读者摩肩接踵的时候，商务、中华、开明以及天祥市场二楼的书局、书摊，都维持着稳定的营业，而位于闹市（今百货大楼对过胜利公园所在地），建筑辉煌，店堂极其宽阔的正中书局却门可罗雀。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励着书店人员，从而更加优质服务，与许多青年读者建立了友谊。

不到半年，读者书店除门市售书外，又通过熟识的学生读者，先后在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南开中学等处，建立了文化服务社，为书店代销书刊，组织读者。通过“送书上门”，把党的声音，革命的声音，渗透到学生运动的波涛中去，直接配合了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初期，曾作过一个统计：五个月时间，通过各校文化服务社，发行了约万册书刊。这种发行方式，在津还属创举，为以后党的发行工作，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基本读者或股东，在天津造纸厂等职工中间，建立读书会，组织读者阅读和销售。此外，还通过街头流动书贩销售。

对读者书店的工作，地下党给予了极大关怀与支持。筹备期间提出“群众集资，以‘灰’色为掩护”的方针，这使得书店迅速取得合法地位（领到营业执照），站住脚跟；以后各校文化服务社的建立和发展，也得到学运领导人的支持和配合。

书店不以发行传播为满足，还先后翻印了几种书：《民主与政治》、《论青年修养》等考验社丛书，方向社丛书，……广泛传播到读者群中。

读者书店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引起敌人注意。先后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自称“郊区农场职工”的盘查和窥测。随后，1948年春和当年8月20日凌晨，又两次昼夜搜查，翻箱倒柜。搜查时在场的，先后有徐才、李秉谦、张殿有、田葆藩。在这同时，外地书店邮来的书刊，也屡遭敌人海关扣压。

经过一系列事变，书店采取应变措施：

把色彩比较明显的书刊，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四大家族》之类，分散转移。函告外地兄弟书店：寄书，改由各大学文化服务社转递。通过书店成员的可靠亲属任希曾，在上海地下党协助下，就往来津沪经商之便，伪装行李，运送“禁书”。店堂书架上增添古旧书。在天祥市场二楼及东马路等处，物色适当店堂或摊位，另辟新的售书点，以防不测。

以前，书店已就所售书的“违禁”程度，采取分别传播的方式，此时更进一步明确分作三类传播方式：

第一类，公开发行的，书架刊台上明摆着。

第二类，一般翻印的，如《民主与政治》、《方生未死之间》、《窃国大盗袁世凯》等等，大多撤出转移，但在比较广泛的对象中传阅。这类书，阐述方式都是曲折含蓄、影射式的，敌人发觉，还有辩驳余地。

第三类，来自解放区的（包括原件翻印），如《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蒋党真相》等等，封皮皆加伪装，只在少